

第2辑

全中華民族團結
組成堅固的長城
期抗战，事一收
速去起，結，日，心，女
將中國

人民英雄

三年以來在人

三十年以來在人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

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周恩來研究

中央文獻出版社



周恩来研究

(第2辑)

主 编 汪 浩

编 委 汪 浩 王家云 朱梅珍
李德友 张 强 张 超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研究:第2辑/淮阴师范学院周恩来研究会编.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

ISBN 7-5073-1237-2

I. 周… II. 淮… III. 周恩来(18981976)—人物研究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791 号

周恩来研究 (第2辑)

编 者 / 淮阴师范学院周恩来研究会
责任编辑 / 刘庆旻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排版印刷 / 江苏省淮安市师苑印刷厂
地 址 / 江苏淮安市交通路 71 号
邮 编 / 223001

850 × 1168mm 32 开 9 印张 25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5073-1237-2/C·139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盗版必究)

前 言

江泽民总书记《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学习、宣传与研究周恩来，对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有着重要意义。

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自 1976 年周恩来逝世以后至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期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周恩来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而言，研究工作仍是长期而艰巨的。

有的研究者担心百年诞辰之后，周恩来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将会大幅度减少。但据近年来国内各种报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看，每年至少 150 篇，累计超过 600 篇；有关周恩来生平思想的书籍也在陆续出版。此外，各地周恩来研究活动仍在持续开展，不断

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淮阴师范学院开展周恩来研究工作,是在1997年10月学院组建后不久,即1998年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周年前后,全国形成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生平思想宣传与研究的高潮中开始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从1998年第1期起开辟“周恩来研究”专栏,迄今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已经成为国内周恩来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学院周恩来研究会每年都组织一次研讨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周恩来研究的深入,必须从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寻找结合点和切入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精神就是“三个代表”的精神,周恩来就是三个代表的光辉典范。加强周恩来精神与周恩来相关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对于深入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建设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较全面地反映国内周恩来研究的最新成果,把周恩来研究引向深入和持久,我们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下,编辑出版了这份《周恩来研究》年刊。年刊按栏目编排,各辑栏目有所侧重。原则上每辑三分之二篇幅选自国内报刊包括《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周恩来研究”专栏的文章,三分之一篇幅刊发各地周恩来研究者的新作,并附录近两年报刊文章索引,供研究者参考。我们相信,年刊的出版,对于周恩来研究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汪 浩

2001年12月

目 录

前言	汪 浩 (1)
----------	---------

·周恩来精神研究·

论周恩来的和合精神	汪 浩 (1)
论周恩来的崇高人格	刘德军 (17)
周恩来的人格精神	王海泉 (29)
论周恩来思想和实践的人民性特征	齐卫平 (45)

·周恩来革命和建设思想与实践·

建国初期周恩来的几次理论思考	鲁振祥 (52)
论周恩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	王家云 刘华益 (67)
周恩来社会发展思想探析	许先春 (78)
论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理论与实践	冉绵惠 (87)

·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国防外交思想早期形式与内容探析	孙富林 (94)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哲学“内蕴”	随新民 (104)

试论周恩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思想与实践	肖宗志 (114)
试论周恩来的对外开放思想	张四海 (124)

·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

周恩来科技发展战略思想特点初探	杨光铮 (140)
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周恩来	曲格平 (150)
周恩来的工业化思想	师吉金 (159)
周恩来经济思想与西部开发的几点思考	曹应旺 (168)
论周恩来关于我国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韩同友 (183)

·周恩来党建思想研究·

周恩来与毛泽东建党思想比较论略	王世谊 (194)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武器 ——学习周恩来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	黄金平 (200)
周恩来党风建设思想	周以侠 (221)

·周恩来文化思想研究·

周恩来中外文化交流思想与实践的特点	赵春生 (232)
周恩来对外宣传思想初论	张沫宁 (243)
周恩来文艺创作理论探析	王 慧 (250)
周恩来与国统区抗战文艺工作	吴小宝 曾 军 (261)
周恩来研究报刊资料索引	许欣 辑 (271)
后记	编者 (290)

论周恩来的和合精神

汪 浩

著名学者石仲泉先生提出，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毛泽东思想和周恩来精神，并由此大力推动周恩来精神的研究。笔者认为，周恩来精神的内涵，可概括为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公仆精神、和合精神、严细精神和修身精神。其中最具个性化、最能揭示周恩来精神特质，最能显示周恩来个人优势的是他的和合精神。和合精神是周恩来处理一切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周恩来的和合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共产主义精神的统一，对于成就周恩来这一伟大人物，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的和合精神，包括友爱精神、团结精神、合作精神、民主精神以及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就是团结友爱、真诚宽容、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爱人精神；就是和睦相处、平等互重、贵和重情、积极参与的合作共事精神；就是虚怀若谷、兼听博采、协调统一、尊重群众的民主精神；就是兼容并包、异中求同、因势利导、整合和谐的思想方法。

周恩来的和合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爱人

周恩来的爱人与儒家的“仁者爱人”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家倡导的“博爱”、“人道主义”，既有联系又有质的区别。其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后者不是平等的，那种“爱”往往是同情、怜悯或施舍，不过是一种“好生之德”。周恩来与一切伟大的革命者的“爱人”，其崇高性在于平等，在于把人民大众看成是社会的主人，是同志，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把“爱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道义的份内事。愿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爱人之情，不是亲情胜似亲情。这里没有资产阶级“博爱”、“人道主义”的丝毫虚伪，也没有封建士大夫那种“仁者爱人”的点丁清高。邢台地震时，周恩来以共和国总理的身份到现场慰问，拉着一位家破人亡、失去儿子的老大爷的手安慰说：“你就把我当作你的儿子吧！”其境界之高远，令千古传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封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以及“天下为公”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为之减色！

“和合”，有“和”才有“合”，“和”是合的基础，“爱人”是“和合”的前提。周恩来在他的一生的一切活动中，处处体现着关心人、爱护人。“文革”期间，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仍抓住一切机会和可能，保护一大批老同志。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周恩来与同他接触的任何人，都平等真诚。为他人着想，理解和关心别人，对人宽，对己严，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回忆周恩来这方面情景时，那情感之真挚，细节之感人，催人泪下。周恩来之伟大，在于他活在人民的心中！周恩来的尊重人，不仅对同志、对人民，那怕是敌人，只要是光明正大而来，周恩来除了不卑不亢，也体现了对对方起码的尊重。从被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在日内瓦与杜勒斯握手不

成，到天安门广场，尼克松主动伸出手来，不仅有深刻的时代象征意义，而且在这一细节里，还折射出周恩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务活动家的伟大风范以及独特的和合精神的光彩！

周恩来的和合精神最重要的表现和 最大优势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一道工作

“和合”不是目的，“和合”为了共事。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和合精神，那就是合作共事精神。当然，“共事”也不是目的，目的是“爱人”，爱天下、爱人民。周恩来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为了彻底实现“爱人”的理想，不仅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周恩来是我们党上述宗旨和策略思想的最早觉悟者和终生贯彻者。毛泽东曾赞誉周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党外保持着最广泛的联系，善于与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合作共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结识的朋友最多，他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化身。

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其中最关键的是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周恩来具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和合”气度和伟人胸怀。在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被开除出党之前，周恩来多次规劝，耐心等待，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王明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几个与王明持相似意见的人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据理力争：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可是他这一正确意见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拒绝^①。在我们党早期领导集体中，由于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曾发生两次排斥毛泽东的错误，虽然主要责任不在周恩来，但由于他当时处于领导岗位，不能说没有责任。尽管如此，周恩来一旦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就在长征途中，与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义无反顾地推举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和影响都不及周恩来，但周

恩来不仅推举他，遵义会议之后，还心甘情愿地做“配角”，多次表示“心悦诚服”，一直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直到逝世。他从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这一角度出发，表现了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达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正因为有了毛周合作，才创造出中国革命这一伟大奇迹。

既要合作共事，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必要时就要做到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周恩来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在王明错误路线时期和后来的“文革”中，周恩来忍辱负重，感人至深。但这也是关于周恩来至今争论最多的方面。其实只要把周恩来放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只要从顾全大局、合作共事、为党为国去理解周恩来的“忍辱”，我们就不仅能理解、谅解，还会被深深感动。

“贵和”是周恩来和合精神的核心内容。“和”就是和睦、友爱、团结、协同；“合”就是合作、融合、协力同心、九九归一。“和”是“合”的基础，“合”是“和”追求的目标。“和合”为了共事，而共事则需先“共人”——相互由不知到知、到信、到默契、到同心同德，追求和合的最高境界——和谐。而共人尤以“和”为先。这种“和”，不仅仅是和蔼、和气、和睦、友爱、团结，而且这种“和”，在互爱互重中要以先爱对方、先尊重对方为关键。这种“先爱”与“先尊重”，主要体现在谦让、吃亏、忍辱上。周恩来曾经说过，吃亏是一种进步。明白这个道理，待人宽且约，责己周且严；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爱不求回报，尊重不讲条件，热情、积极、真诚、无私。只有以这种真、诚、信为前提的诚挚之情才能产生人格的感召力。周恩来正是以他那超乎寻常的坦诚、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广泛的信赖，使他的和合精神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他在合作共事方面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和谐。周恩来是较早进入我党最高领导层，又能终生保持在这一位置上的我党唯一的一位领袖人物。

六届四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与瞿秋白被错误对待，结果决定瞿秋白退出政治局，同时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可是，只有6人同意，不同意的却有18人。这是周恩来得到绝大多数人信赖的结果^②。周恩来是我们党领袖人物中最具人格魅力的伟大人物，这除了他始终清醒、英明之外，还与他的贵和、重情、诚以待人、乐于助人、乐于与人共事这—个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和合精神在领导人身上的必然体现是民主精神

周恩来的民主精神如同他的伟大人格那样，是倍受人们爱戴、今天的研究者时常提及的关于周恩来精神的又一重要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的民主精神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是他和合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恰当表现。这不仅是他爱人民，与更多的人合作共事精神的必然延伸，而且是他尊重群众，虚心地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具体体现。周恩来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靠领导起模范作用。所以周恩来总是以理服人，以诚感人，以情动人，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他一贯尊重民主、弘扬民主、注重民主建设。1919年，处于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就以英文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民主：一个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的政治主张。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活动中，他身体力行，按照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精神，在建党、建政、建国中发挥重大作用，同封建专制主义及蒋介石独裁政治作了不懈的斗争。

周恩来的民主精神还贯穿在他的一切活动中。他平等待人，总是以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他反对一切特权，反对一切封建宗法、等级观念。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中南海过去是封建皇帝的地方，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统治老百姓的紫禁城。现在解放了，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③1966年,他到邢台地震灾区隆光县慰问,交通阻塞,他连忙下车,脱去大衣,代交警指挥,不一会儿满街车流人流疏散了。人们赞叹:“总理当警察,哪个国家,哪个朝代也没见过!”在一次对文艺界的讲话中,他谦逊地说:“我今天所说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④周恩来不仅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从善如流,而且还善于通过平等协商,让别人理解和支持他的正确意见。从不武断,更不专行。即使真理在握,也能平心静气,决不盛气凌人。周恩来正是靠他的平等大度、虚怀若谷、民主协商的精神,使许多同志在他面前敢于坦诚直言,使他赢得了许多诤友,使他的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同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不仅为他集思广益,为他科学地决策提供了保证,而且还从根本上保证了他作为人民总理的人民性。周恩来身处高位50多年,一直与人民群众保持有着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一点儿也没有受到官僚主义的侵蚀,这本身就是奇迹!这同他始终如一的民主精神是分不开的,这是他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远为党和人民信赖和崇敬的坚实根基。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中和者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周恩来在“文革”中起重要的“中和作用”一样,周恩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中和作用,为党的团结、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不仅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为了合作共事,有他素性温和这—个性特征的一面;也有以“和为贵”作为组织思想和策略思想的一面;还有与之相适应的求大同、存小异,异中求同思想方法的一面。周恩来是一位在意见纷呈、各执一端中发现共同点,把大家的意见“和”起来,在顾全大局前提下,因势利导,找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内容,最终形成对革命对事业的最好方案的能手。建国初期,周恩来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

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异是允许的。”他不仅阐明了求大同、存小异的基本原则，还进一步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⑤所以韩素音这样赞誉周恩来：“从他的整个生涯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⑥在中国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周恩来充分表现了在各种矛盾冲突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非凡才华。当然，周恩来的这种“中和”的作用，就他的一生来说，其主导方面是积极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无庸讳言，也有另一方面，也曾有过消极影响。从遵义会议到七大前夕，党内、军队内意见纷呈，周恩来多方面做工作，把若干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把方方面面统一到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确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文革”中，他忍辱负重，对于抑制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化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尤其是为邓小平复出，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这是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如：最初批评李立三错误时，共产国际指出李立三关于当时中国革命处于高潮这一估计的错误，周恩来怕影响党内情绪，提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走向高潮这一观点，采取了中和的态度。这对尽快结束李立三的错误不利，而且为后来王明等人利用批评李立三、瞿秋白的错误篡夺党的领导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再如后来王明等人排斥毛泽东时，周恩来虽有不同意见，但为顾全大局，迁就了王明等人的意见。其后王明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所欲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抗战期间，在南方局王明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推行一切

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周恩来对此认识不足,再次迁就了王明的错误意见,造成一定影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周恩来及时纠正并多次作自我批评。

有些同志就周恩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中和”的失误,便认定周恩来是容易妥协的调和主义者。这是不切实际的。一个调和主义者,政治上首先是个改良主义者。这与周恩来风马牛不相及。少年周恩来,对积弱不振之中国,早存报效之志,尽管他曾经相信“军国主义、贤人政治”日本模式的改良主义救国之路,但是经过推求比较,最终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不动摇、不妥协,尽管条件极其复杂、艰苦卓绝,他都一以贯之。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伍豪之剑令敌特闻风丧胆,在中央苏区,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之间,上有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内有王明宗派团体的破坏,外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处境极其艰难。但他终于从失败和教训中认识到王明的错误,毛泽东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与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义无反顾地推举毛泽东,与王明为代表的宗派团体作了坚决的斗争,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没有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不调和斗争和关键性作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44年,美国为了尽快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敦促国共谈判。中央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协定草案”。蒋介石断然拒绝,并称“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退让:“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中国共产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①。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周恩来的坚强与凌厉。当年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回忆说:“有人说周恩来易于妥协是不公道的,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

直的人，有原则性的人。”^⑧

有人说“文革”时周恩来为了自保，完全迁就了毛泽东。首先，“自保”一说，完全误解了周恩来。这一点，邓小平有公正的评价：“周恩来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了，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了，他保护了相当一些人。”^⑨正如1972年周恩来谈到党内路线斗争时说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⑩其次，“迁就”一说，也不符事实。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以守为攻，与“四人帮”周旋，以“抓革命，促生产”与之相抗衡；四届人大前夕，王洪文去韶山告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不避个人的重大风险，面见毛泽东，争得了主动；特别是对邓小平，“四人帮”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在毛泽东犹疑不决之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推举邓小平。邓小平的复出，虽然只着手短暂的整顿工作就再遭打击，但为他的第三次复出，起到了思想、舆论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应该说周恩来功不可没。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不仅没有迁就，相反，积极主动，甚至甘冒风险，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正因为周恩来富有策略、富有成效的斗争，才使“文革”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作为伟大的中和者，周恩来的重大作用还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西安事变、重庆谈判、万隆会议、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或重大的国务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周恩来充分体现了颜师古注《中庸》所说的“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的精神，把中和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灵活机动，游刃有余。当然，由于受当时世界大局的制约，“和谈”、“合作”、“和平”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但这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争得了很大的主动。周恩来正是一位如列宁所指出的那种“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的

充满智慧的政治艺术大师。

周恩来的和合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切最古老的文化,或者是生殖崇拜,或者是自然崇拜。作为我国古老文化源头的太极图,可以说是二者整合的结果,最早的和合概念,就在这种整合中逐渐形成。刘勰在《原道》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作为人的本性与本质特征,是一切社会活动、价值观念的基础。天道、地道、人道,这“三才”之道,如同冲突双方阴阳和合,犹阴(女)阳(男)“构精”,夫妇合气,交媾融合,才能产生新生儿(新事物)。这个新生儿就是男女、夫妇、阴阳的和合体。这种新生儿(新事物),老子认为是尽善尽美的,是和合的最高境界:“和之至也”。任何事物只有在融突和合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延续和发展,所以叫“和合生生”。故《道德经》说:“和曰常”,“和”是客观规律。这就是我国古老哲学——太极哲学、后经老子等人发展为大和哲学的要义。和合正是这一哲学的精髓。太极图——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中就出现了它的雏形——阴阳鱼和合图式,便是后世关于这一古老哲学结构模式的形象概括。

历朝历代,诸子百家,探求太极、和合的个中奥秘。各自从自己学说的思想体系和自己所处时代需要出发,从太极、大和哲学中吸取营养,从不同侧面深化“和合”的基本内涵,数千年来,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墨、道、名、法、阴阳各家,道不同而趣异,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者,正在于和合之道。《周易》讲“保合太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国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道家讲“乐乃可和合阴阳”(《太平经》),佛家讲“姻缘和合”,商家讲“和合生